

党史资料

丛刊



第4辑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一年第四辑

(总第九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40,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630

书号 3074·616 定价(六)0.57元

内部发行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一年
第四辑
(总第九辑)

回忆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

- 抗战初期“武抗”组织游击队的情况 徐 强 (3)
回忆徐州地区抗战时期武装斗争的情况 郭影秋 (10)
关于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的
 一些情况 郭影秋 (26)
抗战时期新四军苏南地区军工生产的
 片断回忆 张心宜 程 铿 (30)

地下交通·情报工作等

- 四年交通工作纪实 李培南 (37)
敌区斗争中的党的情报工作 刘人寿 (48)
回忆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秘密斗争 李剑华 (55)

抗日救亡运动

-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和
 活动情况 吴驰湘 (69)
回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的活动 韩 进 (77)

访问记

-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月)
..... (81)

目 录

专题研究

“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关于上海地下党保存中央文件的经过的调查

…………… 沈忆琴 宋祖彰 薛森荣(103)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机关何时由汉迁沪?…金再及(111)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更迭考 ……………李义彬(113)

关于《八一宣言》出现于国内的时间 ……………陈 落(116)

《学生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周浩文(118)

关于一九三二年的“共舞台事件”……………李饶翁(123)

《南昌起义研究》中的几个新观点……………金声摘编(127)

读史札记二则……………陈铁健(132)

大 事 记

周恩来军事活动年谱(1924年—1949年)

…………… 张廷贵 潘石英(137)

人物介绍

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三)

……………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148)

革命报刊介绍

《劳动界》和《上海伙友》……………贺世友(171)

来信摘登

刘杞夫并未送情报到上海……………舒志超(179)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一年
第四辑
(总第九辑)

回忆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

- 抗战初期“武抗”组织游击队的情况 徐 强 (3)
回忆徐州地区抗战时期武装斗争的情况 郭影秋 (10)
关于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的
 一些情况 郭影秋 (26)
抗战时期新四军苏南地区军工生产的
 片断回忆 张心宜 程 铿 (30)

地下交通·情报工作等

- 四年交通工作纪实 李培南 (37)
敌区斗争中的党的情报工作 刘人寿 (48)
回忆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秘密斗争 李剑华 (55)

抗日救亡运动

-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和
 活动情况 吴驰湘 (69)
回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的活动 韩 进 (77)

访问记

-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月)
..... (81)

目 录

专题研究

“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关于上海地下党保存中央文件的经过的调查

…………… 沈忆琴 宋祖彰 薛森荣(103)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机关何时由汉迁沪?…金再及(111)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更迭考 ……………李义彬(113)

关于《八一宣言》出现于国内的时间 ……………陈 落(116)

《学生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周浩文(118)

关于一九三二年的“共舞台事件”……………李饶翁(123)

《南昌起义研究》中的几个新观点……………金声摘编(127)

读史札记二则……………陈铁健(132)

大 事 记

周恩来军事活动年谱(1924年—1949年)

…………… 张廷贵 潘石英(137)

人物介绍

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三)

……………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148)

革命报刊介绍

《劳动界》和《上海伙友》……………贺世友(171)

来信摘登

刘杞夫并未送情报到上海……………舒志超(179)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抗战初期“武抗”组织游击队的情况

徐 强

从一九三六年初到一九三九年春，我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派出党员干部到苏南、苏北一些地区，争取、改造和组织领导当地的一些抗日武装力量(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并利用这些武装力量进一步收集当地敌、伪、顽三方面的军事情报。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只抵抗了几个月，以后就节节败退，苏南、苏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政权也都撤走，而敌伪势力只盘踞在沿江沿公路的少数据点。这样，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市镇就暂时形成一片真空地带。同时，国民党军队在匆忙溃退时，遗留下很多被打散的兵员和丢弃的武器，这就为群众武装抗日提供了条件。

在党的团结抗日的号召下，不少地区的群众组织起来，收集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武器弹药，开展群众武装抗日工作。但是，有一些国民党旧军官，收集残部，自立番号，一面武装抗日，一面“拥兵自重”，以此作为政治资本；还有一些地方上的封建势力，趁机拉起队伍，也打着“救国”的旗号，实际上是凭借武力骚扰乡里。在这些

回忆录

武装力量中,有一些已与敌伪勾结,成为反共反人民的汉奸败类;有些部队则企图投靠国民党寻求出路,国民党也想利用和拉拢他们,作为自己在这些地区的据点。在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中,有不少是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希望得到党的领导和支持的进步力量。当时,新四军尚未东进,地方党尚未完全恢复活动,这些地区也还没有党所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去领导其中的进步力量,团结改造中间势力,进步力量就会被削弱,中间势力就有可能落入国民党之手,反动势力必将更加猖狂。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从一九三七年底起,特科就抽调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在上海举办了几期游击队工作训练班,由高原(已去世)主持,训练课程有高原主讲的统战工作和斗争策略,何克希主讲的游击战争军事问题等。训练班结束后,即通过各种渠道把受过训练的同志派到各地游击队去工作,有的同志则留在上海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如方知达(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当时在难民收容所工作,钱明(当时名景智德,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在工人夜校教书,他们二人先后动员了难民收容所中的青年和江湾工人夜校的青年工人、店员一百多人去参加了游击队。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当时不宜用“特科”或情报部门的名义公开领导,所以决定在中央特科领导下成立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这是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实际上是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外围组织。“武抗”曾印发章程,总会设在上海,各地则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分会或支会。我们派到各游击队去工作的同志,都用“武抗”总会的名义出面介绍。这些同志到当地以后,也以“武抗”的名义开展活动并发展成员,一般不随便暴露自己身份。但大多数进步人士都知道,“武抗”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九年春,我们通过“武抗”名义,分批派出党员和抗日骨干到一些游击队去开展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抗

战方针政策,动员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并逐步把一些游击队改造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回忆当时经由“武抗”派去干部参与组织领导以及进行政治改造的武装力量主要有:

(一) 江阴梅光迪、朱松寿部队。这支部队活动在江阴西石桥一带和虞、锡地区,称为抗日义勇军,于一九三八年春与“武抗”建立联系。“武抗”先派老丁(又名老赵,即刘钊)与郑文道去这支部队开展工作,不久调回。“武抗”改派刘史明(现任江苏省交通局顾问)带领方铭(原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已去世)、叶藻(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参谋长)等去接替。不久,又派何克希(现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带领李一平、施光华等几名党员去加强领导,何克希、刘史明、李一平三人组成一个党支部,何克希任书记。另外,从上海动员了一批青年工人和学生去该部队工作,约有三十人。这支队伍开始时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在我们派人参加工作后,才逐步发展,陆续扩充到两个连的规模,有三、四百人。这支队伍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即“江抗”),由梅光迪任司令,何克希任副司令兼政治委员,逐步形成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陈毅曾派吴发坚去担任参谋长,吴不幸牺牲。一九三九年四月,由陈毅下令,以新四军主力老六团为核心,把这支队伍改编为“江抗”东路军,由叶飞率领东进抗日。这支部队曾攻打浒墅关,一度进军至上海市郊,攻打虹桥机场,震撼了上海。

(二) 启东顾南洲部队。这支部队活动在启东、海门地区,也称抗日义勇军。一九三八年夏天,与“武抗”建立联系,“武抗”曾派李文运去该部队。一九三八年底,这支部队受到国民党韩德勤部队的进攻而被打散,其中约有一个大队的兵力,由姚力带领并入国民党江苏保五旅颜秀五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又在地方党同志的帮助下,于黄桥决战时起义。

一九三九年春，顾南洲又与王心余等在启东拉起一个大队的武装。为了应付环境，他们接受了国民党抗日支队二总队第二大队的番号。“武抗”派杨进带了两个党员去这个大队做政治工作。不久，这支部队接受了我党苏北特委（南通、海门地区）的领导，派去的同志就以“武抗”南通区特派员名义，进行苏北地区敌、伪、顽三方面的情报工作。杨进后来调到崇明去开辟工作，启东方面的工作即由李文运接替。

在南通地区，我们还曾派翁迪民（现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副局长）化名宫岳，到忠义救国军的缪中部队中去，任务是了解该部队内部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特务纵队残部的情况。翁迪民担任了缪中部队的秘书，他到这支队伍的驻地南通侯油榨去住了一个时期。当我们了解到这支队伍只是一支徒手的部队，人员不满百人，没有什么作用后，就把翁迪民调回来了。

（三）青浦顾复生部队。这支部队活动在青浦地区，约有一个大队的武装力量。“武抗”派罗星元（化名小徐）带了朱敏中、方子明（陈来生）等几个党员去领导这个队伍。罗星元又派陈来生到杨纪良部队做工作，使杨的部队约有五、六十人并入顾复生部队。一九三九年春，“江抗”东路军第一次东进到上海郊区时，这支部队就改编为“江抗”的一个支队。

（四）太湖和吴江县的程万军部队。程万军在国民党溃退后收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在太湖边上吴江县一带拉起了一支有几千人的抗日队伍。他的一个亲信叫倪之璜，是通过王绍鏊（曾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已去世）的关系以“武抗”名义派去工作的。一九三八年秋，“武抗”又派陈显唐化名丁秉成（即小李）带了施光华、张琼英等一批党员去该部队。丁秉成也从上海动员了一批抗日青年去那里工作。一九三九年，在一次与和国民党有关系的游击队发生遭遇战中，丁秉成不幸牺牲。丁牺牲后，就由张琼英及刘志勇、

施光华等党员带领大部分干部和骨干到昆山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活动，以后并入“江抗”部队。

(五) 无锡邓本股部队。邓在无锡荡口地区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共有六、七百人，编为三个大队，邓自称江浙游击军军长。“武抗”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派杨进化名陈达去该部队担任司令部参议。为了改造这支队伍，我们派去的同志选择了成份比较纯洁的二大队（舒少斌大队）建立起一个模范大队，派从上海动员来的青年去该大队工作，经初步改造，取得了成效。

这支队伍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曾打击了当时锡北地区一支拥有四、五百人，企图投降日本鬼子的封建势力武装部队，即巫耀祖大队。一九三八年十月间，经过反击，又彻底消灭了盘踞在苏州黄埭的黄文秉伪军二个大队，五百多人。从此，在锡东梅村、苏州黄埭、甘露、鸿山一带，形成了一片游击基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邓又率领三个大队的兵力，到武进北乡郑云桥一带，和抗日的大刀会刘金林会合，开辟那里的根据地。他们遭到国民党江南指挥部所属反共的蔡润琪“挺进大队”一千多人的进攻。邓在大刀会的配合下，把蔡的“挺进大队”全部歼灭，并缴获了大量武器，武装了刘金林的大刀会。这一仗的胜利，对新四军“江抗”部队第一次从茅山地区向无锡、江阴一带挺进开辟了道路，说明当时在敌后团结改造游击队武装力量，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起到一定作用。后来，在新四军东进时，这支队伍改编成为“江抗”四支队。

(六) 昆山游击队。这是由民主人士陶一球拉起来的，有两百人左右的队伍。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武抗”派刘志荣（解放后曾任二十军后勤部政委等职，已去世）去领导该部队，以后并入了“江抗”。

(七) 浦东游击队。在浦东活动的游击队中，有一支队伍与“武抗”有联系，“武抗”曾派肖德生去这支队伍工作，后来其中的一

部分转移到浙东，就是浙东三五支队的前身。

除上述几支主要游击力量外，当时不满国民党统治的中间势力，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人和旧军人等，不少人都想利用敌后空隙机会拉队伍，有的希望得到我们支持和帮助，如淮阴的尹卜翰（日本士官生），曾通过关系找“武抗”，要求派党员帮助他在苏北一带拉队伍。

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我党方针政策的影响下，积极赞助抗日救国，也曾与我们发生过联系，如泰兴的朱履先，在新四军来到苏北前，也曾找“武抗”。“武抗”派了李文运去江都地区，帮助抗日的进步青年陈翼发展抗日武装。又如曾在国民党内公开提出“毁家救国”爱国主张的刘汝梅，在遭到国民党打击排挤后，转而找我们建立联系，曾热心帮助我们在崇明一带拉游击队的关系。

总的说来，上海情报部门通过“武抗”这一群众外围组织，运用组织武装的形式，在当时这些地区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派出党员干部去这些地区开展工作，积极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组织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对于扩大和团结进步力量，争取和改造中间力量，共同抗日，并打击反共顽固势力，保护人民群众，都起了积极作用。

通过组织武装，我们逐步建立起一支支由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这些游击队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在与敌、伪、顽斗争中不断壮大。新四军东进时，由于这些队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能迅速改编为陈毅直接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为我人民武装力量进入这些地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通过所掌握的这些部队和各地的“武抗”组织，广泛收集了敌、伪、顽的军事情报。一九三八年秋末，当新四军一支队和陈毅刚到溧阳竹箦桥一带时，特科情报部门把所收集到的情报整理后，用密写药水写在一本旧小说内，派老赵（即刘钊）送到陈毅司令部。情报内

容为：长江以南东部地区各种武装力量，包括日伪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忠义救国军，杂牌游击队，这些队伍的名称、番号、指挥官和头目姓名、队伍人数、武器配备、活动区域和活动规律等。情报内容还包括日军侵略计划和部署。陈毅同志看了这份情况后说：“这份材料太好了，今后我们不再做瞎子了”，并认为这份材料对新四军东进很起作用，连夜派人送到新四军军部。

通过这些工作，我们也输送和锻炼了一批干部。当时通过“武抗”动员到这些地区参加武装抗日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以后不少人成为我党和政府部门、军队中的领导骨干。

回忆徐州地区抗战时期武装斗争的情况

郭 影 秋

抗战以前,在微山湖我们有个特工队,张光中负责,有几条枪,专门打特务。以后,这支队伍被敌人打散了。河南省委特派员刘文来到徐州以后,我们党才考虑在徐州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

刘文是红军长征留在大别山的老同志,他在那里打了三年游击。他给新党员上党课,第三课讲的就是游击战争。他有个小册子,加上他个人打游击的经历,讲得很生动。徐州的所有新党员几乎都听了课。这就为建立武装,准备起义,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思想动员工作。这是一方面的准备。

当时,国民党不允许我们有武装。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在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那里,取得一个“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可以公开搞武装了。开始在沛县,张光中、苗老大四处联络枪支,有地主看家护院的枪支,有土匪的枪支。李明扬也给我们发了一点钱,发了一点枪支弹药。这是我们的最初的公开武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徐州特委在萧县黄口召开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郭子化主持,特派员刘文参加。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徐州西北各县(丰、沛、萧、砀、铜)的党的负责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

议。会议地点在黄口统战对象张仁建开的过客店内。这次会议决定,各个县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凡是党的力量比较强的地方,建有支部的地方,都要举办游击训练班,联络枪支。我们没有枪不行,必须利用亲戚关系、统战关系搞枪。枪支都在地主手里,特别是在小地方,地主一般都有看家护院的枪支。或者动员地主把枪支交出来,或者动员地主亲自参加训练队。在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发展游击队,也可以用联庄会、杆子会的形式。

这次会议以后,各个县的党组织都着手发动武装抗日。没有参加会议的徐州以东各县,也都按这次会议精神布置下去,准备武装起义。当时,丰县的统战形势比较好,李贞乾在上层有影响,举办了训练班。沛县办了训练班。铜山县有些支部办了训练班。徐州东南房村一带,有个小庄叫阴阳庄。阴阳庄党支部书记杨涵之在那里办了一个四十人的训练班。杨涵之是铜山县工委的宣传委员。徐州以北有个和尚庄,地处铜山、沛县交界,党员比较多,叫沛铜支部。支部书记王清惠在和尚庄办了一个训练班。王清惠以后牺牲了,他们一家牺牲了不少人,他的两个侄儿都是烈士,一个叫王家襄,一个叫王家枕。

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后,特派员刘文向我传达了特委关于在徐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大体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徐州为中心,沿着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分成四块。徐东北,包括贾汪、枣庄煤矿和鲁南山区。徐东南,包括铜山的南部、邳县、睢宁、宿迁。徐西南,包括萧县、宿县、永城。徐西北,包括丰县、沛县和萧县、砀山、铜山三县陇海路以北的地区。这四个地方都建立区委,相当于小地委。特委准备搬到鲁南山区,徐东北的工作由特委直接管,不建区委。徐东南,区委机关放在睢宁,书记是张芳九,组织委员是吴季诺,宣传委员叫我兼着,实际上我没有去,我在徐州五战区的工作分不开身。徐西北,区委书记是王文斌,北师大的学生,丰县人。

徐西南，区委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看来，徐州特委当年这样划分是恰当的。形势发展，徐州城市肯定要陷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敌人一定要掌握。后来，苏皖地区、萧宿永地区、湖西地区、鲁南山区（包括江苏陇海路以北地区）四个抗日根据地，就是由此发展成的。

另外，关于枪支准备问题，我们一共联络了多少，没有个数。当时，我掌握了徐州民教馆的学生训练枪支，全部发给了我们的游击点。我对铜山的布置是这样的，徐东阴阳庄支部发四十条枪，二千多发子弹。徐北和尚庄支部发二十条枪，一千多发子弹。徐南夏楼个别党员刘光宗，发二十条枪，八百多发子弹（这部分以后没有起作用）。徐西布置给萧北耿兴义，发给卢套一部分枪支，有一支冲锋枪和几支步枪。东贺村乡长佟振武，向我们要枪，我们发给他五支。其他各点没有发枪。

把一个农民变成兵，很不容易。徐州沦陷以前，我问特派员刘文，将来打仗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说一要有一支钢笔，可以通讯、草拟命令。二要有一块手表，可以计算时间，便于指挥。那时，我没有表，就生办法买了一块表。三要一个皮包，可以装文件，文件不会被雨淋湿。我又生办法买了一只皮包。四要有干粮。当时，徐毓生在场，他说可以叫家里烙煎饼，装在口袋里，可以放半年。实际上，真正干起来，这些准备除了钢笔可以带在身上，其他在实战中都用不着。戴着手表，提着皮包，战士会对自己产生距离，带半年干粮更不可能。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晚上，我在徐东小塔山听说国民党要撤退，走了一天，回到徐州，西线很紧张，沿途可以听到炮声。铁路交通阻塞，一辆辆火车装满盐巴、面粉、炮弹，全被国民党军队烧掉了。溃兵、难民如同潮水一样，混乱得很。我回到徐州，先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后到我们特委机关，都没有人了。我又到警察局找我们的联络员警长王景武，也找不着。有一个换上便装的警

察认识我，叫我快离开徐州，说街上一队队巡逻的人，都是汉奸的人，不是我们的人了。我很疲劳，便跑到快哉亭公园九曲桥中间睡了一觉。第二天黎明，日本人从徐州西边向火车站打炮。我跑到坝子街民教馆，想取放在寝室里的两支驳壳枪，一支手枪。跑到那里既无人，也无枪。后来才知道枪叫陈筹取走了。

然后，我随着难民一起离开徐州，向东南跑了七十五里路，找到阴阳庄支部书记杨涵之。我到之前，日本飞机已在阴阳庄撒了传单，其中有徐州陷落，火车站上插着日本太阳旗的照片。他见我之后很紧张，说日本坦克已开到双沟，形势吃紧，你怎么还来？我说我们应该把枪扛起来，搞武装抗日。当晚，我们召开支部会，动员训练班的人集合，农民都不愿意来，做了一夜工作，只有十几个愿干，发了枪。第二天拂晓我刚瞌睡，杨涵之就把我推醒了，说半夜里日本人已开进庄北一里半外的村庄。我抓起一条枪，装了两布袋子子弹，就带着那十几个人向西南跑。我们跑的方向，正是日本人前进的方向，我们在前面跑，日军在后面追。跑了半天，赶到栏杆山，想找郭子豪，整个庄子全跑完了，一个人也没有。带来的那十几个人，只剩下五个，其余的都跑散了。我们继续向西南走，估计总会碰到自己的人。在夹沟车站以东，聚集很多国民党的败兵，他们身上都背满了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乱糟糟的，不成样子。徐州动委会青年干事狄克东、李光义等四十多人，跟随败兵一起，准备夜晚过铁路。我们相遇之后，我问狄克东他们是怎么从徐州出来的？狄克东说，西线吃紧时，他去司令长官部请示，青年怎么办？司令长官部很镇静，说你们不要紧张，徐州以东，我们有四十万部队，你们怕什么。过了两天，形势更紧张，狄克东又去司令长官部打听，人都跑了，只剩下两个参谋。那两个参谋要狄克东快走，马上就走，朝双沟方向跑，不然出不了城了。他们千把人跑到双沟，遇到日军的坦克，被打死很多人。他们这四十多个人要求